

论日本近代女性作家的 肉体记忆与精神记忆

黄芳

(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重庆 400031)

摘要:记忆这个文化学的核心概念,为日本女性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在日本的明治、大正时代,日本虽然学习西欧的先进文明,却将女性置于此外,仍然以“贤妻良母”为妇德标准来束缚女性。“生儿育女”是日本近代女性作家的肉体记忆,“贤妻良母”则是精神记忆。女性作家在作品里否定社会对其“生儿育女”“贤妻良母”的定位,肯定满足自我欲望的“主体的性”,以争取女性的肉体解放和精神解放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而深层次的文学内涵则是要重塑女性作为主体的肉体记忆和精神记忆。

关键词:肉体记忆;精神记忆;贤妻良母;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I3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0)03-0046-07

0 引言

“记忆这个关键词如今已成为文化学的核心概念”(冯亚琳,2012:117),正是这样一个文化学的核心概念,为日本女性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迄今为止,有关女性文学研究的学者和研究成果不在少数,其研究方法大多沿袭了文本分析、故事性研究、以及社会影响等现象研究和解构方法论,鲜有从哲学的高度和文化记忆的视角去思考日本女性文学的区别于他者的学术成果。本论以女性作家的肉体记忆与精神记忆为论点,试图从哲学的高度去考察日本女性文学中反映出来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同时在日本女性文学的趋同性中,去寻找日本女性文学体现出来的共同记忆。日本女性文学有着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性。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步入近代文明的大门,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近现代科学技术,更是在思想领域将日本从单一的东亚文化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文学的世界里,近代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们对男性社会灌输给女性的肉体记忆和精神记忆开始持有疑问,并在文学作品里对男性强加给女性的所谓道德规范倾诉着不满,试图与传统道德进行抗争。自20世纪20年代到日本战后,在男性文学占据主流的时代里,日本有一批女性作家果敢地以女性视角去审视、观察和描写女性生活。透过这些女性作家的笔触,可以了解到她们是在与当时主流意识格斗的过程中坚持创作。她们努力在作品中通过行为塑造区别于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注重肉体的觉醒过程中,更注重精神的觉醒,而精神的觉醒反过来又支配着曾经无奈的肉体。

笔者认为,日本近代女性作家在作品中构筑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实际上是“性/天命”“性/本能”“性/武器(性的社会学属性)”三者的不同排序组合形成的女性性格的显现。比如:“性/天命”“性/本能”“性/武器(性的社会学属性)”的排列大体上表现出贤妻良母的性格特征;“性/武器(性的社会学属性)”“性/本能”“性/天命”的排列构筑女性主义的性格特征等。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作家们认为以满足男性欲望的“客体的性”(sex)和以满足自我欲望的“主体的性”(sexuality)只是若干类型组合中的一种形式而已。

由此可见,所谓的女性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近代女性文学根据上述三者之间的不同排列

收稿日期:2020-0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日本近现代女性文学的精神记忆与肉体记忆研究”(17BWW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芳,女,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日本近代文学、日本女性文学研究。

组合,女性作家们努力尝试将传统的、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形成的女性角色从令人窒息的桎梏中释放出来,使读者能够在女性文学作品中看到女性的呐喊和新的自我的实践。不少学者认为,近代女性文学在出发时的基本特征便是女性解放,“女性文学就是女权运动的自我表现”(高良留美子,2013:116)。女性作家在作品里否定社会对其“生儿育女”“贤妻良母”的定位,肯定满足自我欲望的“主体的性”,看似争取女性的肉体解放和精神解放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而深层次的文学内涵则是要重塑女性作为主体的肉体记忆和精神记忆。在此,本文力求以日本女性文学作品加以佐证。

1 日本女性文学中的肉体记忆

1.1 “性/天命”——传宗接代的工具

现代医学的发达使得变性成为可能,但无论多么完美的改变,由男性变性而来的“女人”终究不能生育。所以,“生育的性”是女性区别于男性的本质,正是这一本质的区别,使得男、女在看世界的过程中,产生认知差别。如果将这种看世界的认知差切入到文学创作的领域,我们便会轻易地发现,女性作家在女性人物塑造上有着男性作家不具备的独特性。譬如男人没有亲身经历,永远无法体会女性生育过程中的期待、恐惧、疼痛,更有甚者以至于患上产后抑郁症。男女在身体上的性具有不对称性,因此“生育的性”只有女性作家才具有话语权。女性身体的最大功能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这便是深深烙在女性脑海里的肉体记忆。社会对女性性角色的教育,也因此定位在“生育的性”是女人自然扮演的角色(“性/天命”),殊不知女人生育是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极度危险的事情,个中痛苦只有女性作家才能真正明白,因此她们在作品里所展现的身体叙事具有男性作家无法企及的强烈的自然情感与渲染情感的冲击力。

明治时代的诗人与谢野晶子较早对女人的“生育的性”持有疑问,她认为男人永远无法理解妊娠的烦恼、分娩的痛苦。在晶子生活的时代,女人如果没有后盾便无法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因此自然而然将结婚作为唯一的终极目标,女人被社会教育成“人生就是为了做妻子”(岩淵宏子·北田幸惠等,1995:87)。在女人生育被看作是理所应该、禁止诉苦的氛围下,晶子的《産屋日記》敢于描写对令自己怀孕的男人的诅咒,女性生育的痛苦得以淋漓尽致地渲染和发泄。为了从家族制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她一直渴望近代的恋爱。一生在孤独和文学中度过的晶子,将其思想和身体的孤独以拼命生孩子的女人的孤独感的形式诉诸文本,从她关于生死极限状态下的身体叙事中,可以管窥近代女性在拼命地撕裂自我。在《第一阵痛》里,体现了女人对分娩的恐惧、死亡的觉悟。晶子生过12个孩子,每次分娩时都经历过死亡的威胁,她深知女人为了传宗接代而付出了巨大代价,因此晶子从未停止对女人的讴歌。女性生育的阵痛只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才有切身体会,男人无法了解这种痛苦,对此晶子深感“对男人的憎恨”。我们必须高度评价对女性的“生育的性”勇敢发言的晶子。在那个年代,女性生儿育女是天职天命,因此怀孕时的痛苦便不能与人言说,何况分娩被看作是污秽避忌的事,将之表露出来是女人的耻辱。《産屋日記》《初産》《宫子》等作品里表现了女人分娩时的痛苦,导致她不惜用“憎恶”“兽性”等来表达对令自己怀孕的男人的怨念。她无视贞洁、忍耐、温顺等传统妇德,讴歌自我,将情欲、官能的力量转换为女性解放的力量。

另一位女性作家水野仙子的作品,同样重彩描述女人必须面对的妊娠与生育的问题。在《徒劳》里通过一个14岁的小女孩阿纹作为叙事者来描述了一个异常分娩的场景。痛苦的呻吟和想让孩子生存下来的绝望叫声充斥在整个文章里,难产场面十分具有冲击力。由于将分娩过程当作“污秽”的事,男人忌讳进入产房,因此男性作家只能凭借想象去描写,没有超乎想象的疼痛和出血的描写自然不会具有现实的张力,而仙子将原本应该遮掩着的现场还原于小说之中,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女主人公阿菊在分娩时泪流满面地对阿纹说“小纹,你这一辈子千万不要嫁人啊。”由此可以看出阿菊在分娩时的痛苦和对必须经历结婚—妊娠—生育的女人这一天命的诅咒。

以《徒劳》为契机,仙子开始不断在作品里对生育进行挖掘。在《阿波》里,描述了一个因生孩子而疯掉的女人的悲剧,在生第4个孩子的时候阿波疯了,仙子把女人必须独自承担的生育的痛苦演变成了对男人的

憎恨,由此可以看出生孩子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影响巨大。《女医的故事》则通过女医生的视角去描写在各种不如意的妊娠之间徘徊犹豫的女性。每当看到顺利分娩、母子健康,仙子均认为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

在无产阶级作家平林泰子的眼里,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征服女性之上的文化”。小说《夜风》的故事以阿仙的分娩阵痛开始,发疯结束。生儿育女本来应该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可阿仙却独自躲在土屋分娩,没有任何帮手,穷得连一件婴儿褥衣都买不起。加之没有婚姻的保护(私生子),因此只能选择杀死婴儿,而阿仙也因此发疯。她最后发出的狂笑是下层社会妇女对父权支配的男人世界的抗议。在下层社会,女人遭受双重压迫,身体除了传宗接代,还要随时忍受男人的殴打。平林泰子的另一部作品《殴打》讲述了女儿银子看不惯农夫父亲常常殴打母亲,孤身一人来到城里,与一个叫土方的男人同居。某天,她看到土方遭监工殴打,忍不住大吼一声。没想到面对监工卑躬屈膝的土方转过头来却对着她一阵拳殴。银子被打倒在湿漉漉的地上,大声号哭。她没有任何的抗议手段,只能用号哭这种身体语言来表达其愤怒。女性作家们在小说里对“性/天命”这一肉体记忆带给女性的危险和痛苦进行了生动的书写,并为女性发出了呐喊。

1.2“性/本能”——母性角色的摒弃

女人的身体具有两种特征:一是与妊娠、分娩相关的“生育的性”(“性/天命”),一是作为快乐对象的“女性的性”(“性/本能”)。近代的女性作家们将身体从部位、感觉以及想象等角度进行了叙事,迥异于男性作家们笔下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女人的身体除了可以生儿育女,还可以感受性爱带来的快乐。对生儿育女的“母性”的憎恶和嫌弃意识推进了女性作家们在小说中大量地对女性身体进行肯定叙事,具体表现为对母性角色的摒弃和对女性身体的赞美。

园地文子的作品多描写在制度压抑下的女人性记忆的唤醒和女人的生命力。“性的快感传递到子宫里,子宫便发出抑制不住地呻吟。”从官能与子宫的关系来描述女性的性,原本只属于丈夫的“女性的性”被表达为女性自由的性,因此引起了男性评论家的反感,平野谦指出“这是子宫一词的滥用”。这证明了女性如果要选择“为官能而生的性”是不被认同的,尤其是被男性评论家所抵触。尽管如此,女性作家将反叛制度的“性/本能”作为主题来宣扬和充分肯定,在自己的作品里尽情渲染女性可以把握自己的性。被唤醒的官能使得子宫瞬间发出呻吟,尤其在幻想被男人袭击之后“血往上涌”的身体感觉表达了女性同样可以在性爱中体味性的快乐。濑户内晴美的《花蕊》中的“花蕊”便是子宫,她认为“花蕊”是她存在的根据,是女人的生命源泉。而与谢野晶子的《乱发》则充分肯定女性身体的官能性,塑造出一个积极恋爱的女性形象,晶子在短歌里经常描写“乳房”这个身体部位借以大胆讴歌恋情和女性的性欲。近代以后,在公开场合对于性大家都讳莫如深,将之封闭于“家”这个私人的领域,并严格要求女人要守贞操。对一般女性来讲,性是压抑的,表达性是一种禁忌。当与谢野晶子在《乱发》里表现女性身体内部躁动的情感时,受到了男性评论家们严厉的批判,说她“记录的是猥琐丑态”。女人只是男人欲望的对象而自身不应主动享受性的愉悦。可见男人根本不会考虑女人的爱欲和本能。《乱发》最早将女性作为主体而加以全面肯定,并高歌恋爱的喜悦和女性的美丽,其大胆令世人惊叹。

在日本近代女性文学里描写少女思春期的官能小说并不多见,大正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田村俊子在《离魂》里将初潮与性萌芽结合在一起,强调身体变化带来的敏锐感觉,这是一个男性所不能了解的女性心理世界,是根植于女性身体、女性感觉之上的女性作家的表现。俊子是表现女人的恋爱和进行身体叙事的先锋,其涉及少女的性的代表作有《枸杞果实的诱惑》《离魂》。前者描写被强奸后的少女受到的性诱惑,后者描写少女的初潮前后青春期特有的身心反应。性觉醒的少女开始意识到异性的身体和体味,初潮的到来令其精神上产生不安从而引发梦游般的“离魂”现象,真实反映了思春期少女敏感的神经和心理状态。

关于性欲问题一直以来认为是男人的事,女人只能在闺房里顺应男人,然而大胆描写性爱的女作家田村俊子笔下拒绝描写妻子只能迎合丈夫的女性形象。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言说空间里,女性书写的范围深受制约的情况下,《女作者》里“为自己而活”是“女作者”内心的强烈诉求,但在婚姻里却是很难实现的梦想。因此女作者以虐待男人而获得性兴奋的性倒错式的倾向,以及靠化妆或脂粉的气味来勾起性欲等方式,表

达女作者无法逃出制度桎梏时的烦躁和挣扎,以及其强烈的祈求解放、越境的愿望。《炮烙之刑》里则宣扬尽管爱着丈夫,但另有新欢又有何不可呢?田村俊子在《生血》《女作者》《木乃伊的口红》等一系列作品里将此问题提出,并通过耽美的官能渲染,塑造出为实现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在追寻自我独立的过程中与男人们的冲撞和激斗,尖锐地对男权优越的不平等社会里的女性歧视加以抨击和批判。

佐多稻子的《裸足姑娘》吸引读者的魅力之一便是题目新颖。“裸足”这个词可以唤起各种文化记忆。裸足原本是恋物癖的代表,令人产生官能的联想。稻子将裸足具有的性感作为身体的记号加以巧妙的运用,将之作为少女追求自由奔放的欲望的象征,作为反抗世俗、主张自我、寻求解放的主体,而非男性作家眼里的男性快乐源泉的客体。

女性作家们通过对女性身体部位“乳房”“子宫”的描写、对女性初潮引起的心理变化的细致描述、对少女裸足的赞美等一系列女性身体的肯定叙事,以此倡导满足女性自我欲望的“主体的性”(“性/本能”),否定男性中心社会里形成的满足男人欲望的“客体的性”,颠覆女性身体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这一世俗观念,这是对母性角色的摒弃。

1.3 “性/武器”——女性“主体的性”的倡导

到明治文明开化期,教育孩子的责任被转换到母亲身上。“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作用分担愈发明确,是社会在近代化过程中广泛存在的一种性别角色分担的特征。明治三十二年,高等学校校令明确规定女子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贤妻良母”,女性的性别作用被限定在家庭内部。家庭就是一个枷锁,牢牢地锁住女性。女性解放的本质就是欲从“性/天命”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性的自由和肉体解放。女性作家们为此选择同性恋这种新的方法进行尝试。

宫本百合子的《伸子》以主人公伸子的恋爱、结婚、离婚为主题,一直被认为是深挖男性中心社会婚姻制度本质的好教材。素子是伸子的女性朋友,她出现在伸子婚姻遇上暗礁的时候。在家长制度下,女人为了男人而相互猜忌、相互背叛,鲜少女人之间的友谊,因此女人的友情便是对家长制的一种反抗。其新意在于女同性恋题材动摇了异性恋的爱之结构。大正到明治期间流行同性恋,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女同性恋却被定为性变态。宫本本人在一次偶然机会遇到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浅野芳子,双方相互吸引,之后与丈夫离婚,和芳子开始共同生活。在婚姻制度里生活的女性大多按照男人的意愿而活。“百合子通过与芳子的关系,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婚姻”(川西政明,2012:211),并深刻理解了女性的性欲:欲望应该是自然表露的东西,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爱的表现从本质上来讲应该是自由的,性的欲望可以超越男女。在男性中心社会,女人是男人的附属物,女人的主体受到伤害和践踏,丧失了原始的爆发冲动,从而变成被动的躯壳。经济与人格的平等使得百合子认为她与芳子便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形态,而在男女关系中,女人会丧失灵魂。在1910年至1930年之间,前卫女作家们大都有着同性恋的经历,比如田村俊子就曾经历过,她积极肯定女人的性欲,用描写同性恋的形式来对异性恋的制度化倾向表示抗议。

宫本百合子的另一部同性恋题材作品《一枝花》则从朝子的角度去描写朝子和幸子的同性恋,虽然与幸子的生活维持着表面上的安定,但朝子内心已经凌乱,朝子的动摇是因为在男权社会,女同性恋被看成是异端的爱,很难获得社会的认同。禁忌之爱使得性爱变得困难,官能被完全封闭。之后,朝子便从这种性身份认同的危机中逃离,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朝子被社会规范所束缚的象征。

吉屋信子的《屋檐里的二处女》明确探讨女同性恋的女性主义的潜在可能性。吉屋信子的小说大都是“处女同盟”的故事,女性爱优先于异性爱,近代异性爱制度的基础是“家族”,她的异想天开吸引着大批身处异性爱制度家族樊篱里的女性读者,勾起了她们的越境快乐。吉屋信子的小说具有大众性、边缘性,她不像其他“青踏”女作家们极左地从理论上去主张女权,而是将自己的主张在小说里如糖衣炮弹般慢慢地渗透进读者的脑海,以此表达其女性平等的诉求,其主张的“处女同盟”是女性主义文学和运动的中流砥柱。

男权文化压制女性,通过对女性的性控制来实现对女性精神的控制。但女性作家们不受传统观念和伦理道德的约束。随心所欲的恋爱、拒绝生育、进行同性恋的尝试等,均是女性作家们将女性“主体的性”作为武器,为争取性自由和肉体解放做出的努力。

2 日本女性文学中的精神记忆

2.1 贤妻良母——传统规范

在1896年,明治规定女子应该被关在家里,贤妻良母主义的女子教育得以制度化。“规定理想女性应该通晓传统的妇道伦理、具备一定的知识修养,能够胜任相夫教子之职。”(刘春英,2012:238)女子从小学教育开始便被强制性地接受将来为人妻、为人母以及做家庭妇女的思想,对男子和家族制度要服从,多数时间都用于学习裁缝、家政,所谓的修身课就是阻碍女子精神独立、成为男子附属物的一种特殊教育。

即使在当今社会,女性虽然拥有自己的职业,但妻子、母亲的作用仍然被放在首位,在女性的精神记忆里,将“贤妻良母”作为一个价值判断基准来规范和限制自己的行为,“贤妻良母”这一词汇象征的生活方式已经在女人脑海里根深蒂固。一个女人的身份首先是妻子,其次是母亲,已婚妇女的天职便是妻子和母亲,一切皆为丈夫和孩子而存在。明治时期的女性没有获得市民权,处于男性以下的地位,属于被支配者。明治政府谋求将国民塑造成“富国强兵、贤妻良母”的男女身份。时代还希望将女性封闭在狭小的世界里,认为“女子不学为好”,“贤妻良母”这一精神记忆如同一个枷锁,牢牢地约束着女人的行为。进入近代以后,西方思想的影响使得女性开始产生性差意识(jender),意识到男女社会角色分工的不平等,于是便开始反抗。女作家们透过缝隙极力表现着自我,在女性文学的世界里书写着为挣脱这一精神枷锁而努力的女性悲歌。

园地文子的《女人坡》描述了明治时代被迫过妻妾同居生活的妻子痛苦和隐忍的一生。里面没有明显的暴力描写场面,这是因为女主人公阿伦和围绕阿伦身边的主要人物均是中上流阶级,表面上看与粗暴无缘。其丈夫白川行友位高权重,风流倜傥,妻妾成群,这便是令阿伦痛苦的根源。面对肆意妄为的丈夫和那群女人,阿伦充满嫉妒和怨恨,可所受的“丈夫即为天”的教育使得她不得不忍耐,不能流露出半点埋怨和不满。不过阿伦逐渐认识到纵容丈夫行为的日本家族制度的不妥,意识到保持自我尊严的重要性。阿伦在临终之前留下的遗言是“我死了绝对不要办葬礼,将我的遗骸使劲抛向品川的海里即可”(园地文子,1971:115)。拒绝葬礼意味着一生深受封建礼教所害的阿伦拒绝了长期束缚着她的家庭和丈夫。婚后尽心尽力服侍丈夫和强忍痛苦照顾家里那一群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从未表露过。临时之际,终于敢用尽全力大声说出对丈夫的怨恨,这是对以其丈夫为代表的日本男性本位的家族制度的血泪控诉,因为这一制度严重阻碍女性的独立思考和丰富情感的培养,剥夺了女性自我表现的权利。尽管阿伦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她痛快地说出“使劲抛向品川的大海即可”这句话使得怨恨得以尽情地宣泄。战后,不认可女性权利的旧民法被废除,妻妾同居的现象虽然减少了,但家暴的男性数字并未减少。新型家暴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对女性身体的伤害,而在于对女性精神上的伤害和亵渎。由于对家暴者的恐惧,多数女性敢怒不敢言,为保护自己连最基本的自我主张都不敢为。

战前,女性与男性在性上是不平等的。首先女性的性对象必须是男人,其次,女性只能和丈夫发生关系,如果与丈夫以外的男人发生关系便会被处以通奸罪。直到1947年日本修改了民法和刑法,才废除了家族制度和通奸罪。贞操是男人对女人单方面的要求,因此《良人的贞操》里提出男人也应该守贞操。贞操是束缚女性身体的一种精神枷锁,主要问题在于“从未要求男人的贞操,只一味要求女人的贞操”这样的道德形式和法律的不公平,尤其是对未亡人。在丈夫死后,未亡人不仅被要求要守住贞操,还要忍受社会投来的各种异样目光。大正至昭和时期的流行作家三宅安子年纪轻轻便与丈夫死别,一个人独自养大4个孩子。她将这些生活的艰辛写进小说,在小说世界里大量涉及未亡人的问题,《奔流》是其代表作。该小说采用家庭小说的方式来描写一直以来被视为禁区的“未亡人恋爱”题材,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当时的制度下,一般允许维持家族制的再婚,但社会传统观念并不允许未亡人自由恋爱,用“贞女不嫁二夫”来要求妇女恪守妇德。三宅用辛辣的笔调对男性社会强加于身的妇德束缚进行了批判。《奔流》里的性描写比较隐晦,将未亡人对恋人的纯真情感娓娓道来,主要着墨于未亡人受压抑的内心情感纠葛,倾诉被家族制度囚困的未亡人的苦恼,并最终对家族制度提出了质疑,令人体味到未亡人生活的艰辛。

2.2 不容冲破的樊篱——家族制下的殉葬者

近代女性的最早表现者是岸田俊子。在女子“不学为好”思想的教育下、“要求女性服从丈夫、孝敬姑婆、具有献身精神,要贞洁、忍耐、顺从,在与外界隔绝的家庭里度过孤独的一生”(渡边澄子,1998:8)。《告同胞姐妹书》里,岸田俊子严厉批判男尊女卑思想,剖析男性制度下女性的不幸产生的根源,号召广大女性打破传统旧习,打碎男人的美梦,争取同权社会的实现。她认为:社会本是由男女构成,可男人却凌驾于女人之上。男性比女性优秀的人才多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多、见多识广,而女性被关在家庭里,未受过什么教育。为了令被灌输了隶从于男人便是妇德、甘愿被置于男人之下的女性同胞的觉醒,她高呼“女性们觉醒吧!女性们奋起吧!”俊子博学多才,学贯古今,具有“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豪迈气概。认为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被创造为女人的。她列举古往今来的女中豪杰,力证女性在体力、智力、精神力等方面并不逊色于男性,妨碍男女同权的是教育和财产继承等社会结构。大正民主主义思潮的开始时期,站在时代先端的、聚集在“青鞾”杂志社的新女性靠自己意志找工作来维持生计,她们以亲身经历感悟到贤妻良母主义是将女人推向社会底层的元凶,于是她们欲摆脱贤妻良母规范的束缚,冲破家族制度的樊篱,采取的方法便是主动选择离婚。

清水紫琴的《坏戒指》以口语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描写了在现行婚姻制度下痛苦女性的自立,这是一部有着强烈的社会意识和女性意识的作品。在家长制下,妻子不能主动提出离婚,可该小说打破这一传统,主动选择离婚这样离经背道的道路(岩淵宏子·北田幸惠,1995:17)。戒指是婚姻的象征,女主人公坚持在人前戴着丈夫送的被取掉玉石的坏戒指意味着婚姻的破裂。她每日带着坏戒指的目的在于提醒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段破碎的婚姻,以此告诫年轻姑娘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坏戒指成为女性主体形成的推动力。平塚雷鸟的女性宣言《原本女性是太阳》则呼吁女性要做自我发光的太阳,唤醒女性主体的觉醒。雷鸟认为当今女性的不幸在于婚姻不是基于恋爱而是经济关系,为了获得终生的生活保障,向一个不爱男子出卖“性”。因此与其企盼“一夫一妻制”的实现,不如追求女性精神上的、物质上的自立,或者与喜欢的人恋爱结婚。

樋口一叶的《十三夜》同样是女子离婚题材,女主人公阿閔回娘家的目的是告知家人想要离婚的打算,但在听了父亲的一番劝说之后,为了弟弟和孩子,毅然决定不离婚,又坐车回到魔鬼丈夫的家。女儿为家庭牺牲个人幸福在明治文学里是一种常态。如果离婚,阿閔得不到孩子,弟弟的工作也成问题。子女和家庭的双重羁绊,使得阿閔唯有将所有的痛苦独自往肚里吞。束缚阿閔的是血缘关系,这使得人生充满了无奈。阿閔的结局意味着要冲破家制的樊篱可谓困难重重。樋口一叶的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明治时代的妇女的悲哀,可以说是明治时代女性的悲歌。在近代还未完全迎来黎明的时代,她们哀叹、忍耐、无力抵抗,最后不得不成为家族制的殉葬者。在男性评论家的眼里,女人的可怜是一种悲哀美,因此在男性文学占据主流的时代,一叶成为被男性作家和评论家认可的女性作家之一。但一叶描写的并非女性的悲哀美,而是活在重压下的女人的坚强和对家庭压迫女性的抗议。《十三夜》里一叶为女人找到了一种身份:女人不是一个“人”,而是母亲、妻子、女儿。她批判虐待女性的社会,倾诉女性的悲哀,对容忍男人横行的社会提出了抗议。

顺从父母之意老实做贤妻良母被看作是恪守妇道。明治三十年代流行的家庭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遵从贤妻良母的规范,以自我牺牲或献身的方式来获得幸福。这一意识形态严重妨碍了女性发现自我的能力和欲求,从而得不到自由幸福的生活。大塚楠绪子的《空薰》的女主人公雏江才貌皆备,但她对于社会给妻子所定的行为规范持有抗拒心,不遵从这些规范,也不怎么伺候丈夫,反而随心所欲地操纵着整个家庭。这个女人完全不符合家庭小说里的主人公形象,她不但守妇道,反而背叛丈夫。这是一部与通过家庭小说的形式将女性锁进贤妻良母行为规范里的时代潮流抗衡的小说,可以说是一部极好地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想的优秀的反家庭小说。

3 结语

日本近代女性作家大都接受过“丈夫即为天、逆天要遭天谴”这样的妇德观念的教育,社会上贤妻良母思想占据上风,不认可男女对等关系。男性通过统治女性身体来实现对女性的压迫,从而达到控制女性精

神和自由的目的。近代女性作家是在个体被否定的时代、在制度的重压下,只能透过缝隙管窥,并通过所学的知识了解外面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她们通过自己的目光去观察社会、观察男性、观察家庭,并凝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倾诉在争取权利过程中的苦恼。她们意识到:要想改变女性的附属地位,必须使女性从生育的功能中解放出来。争取女性堕胎自由,要求男人守贞操,同性恋的尝试等,均是向男权挑战的姿态和立场,是一种颠覆男权统治的策略。

在否定生儿育女的性角色定位的同时,对满足自我欲望的“主体的性”(“性/武器”)进行了肯定叙事,争取“我的身体我做主”的权利。另一方面,冲破“贤妻良母”这一束缚女性的传统观念的桎梏,以期实现女性在肉体和精神上的解放和自由,并在人格上争取与男性同权。她们用第一人称的形式将大写的“我”这个女性置于小说的中心,以“我”的形式生存,敢于挑战男性社会规则,敢于抵抗男性社会暴力,给予广大女性读者鼓励和勇气。女性解放的斗争便由明治时代的一群觉醒的女性作家开启。她们否定“生儿育女”(“性/天命”)这一被灌输的肉体记忆,对女性身体(“性/本能”)进行了赞美,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起到了先驱作用。同时,欲冲破深烙在脑海里的“贤妻良母”这一精神记忆的樊篱,争取实现女性的精神解放和自由,将体现贤妻良母性格特征的“性/天命”—“性/本能”—“性/武器(性的社会学属性)”的排列改为体现女性主义特征的“性/武器(性的社会学属性)”为首位,其实质是欲重塑女性的肉体记忆和精神记忆。她们从未放弃努力,但是争取女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权利是极其困难的事情,直至进入现代,女性作家们在实现女人到人的意识转变时,才“成功把反记忆书写进女性的集体记忆中”(黄芳,2017:25)。

参考文献:

- 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 2012.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G]. 余传玲,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高良留美子. 2013. 樋口一葉と女性作家一志・行動・愛[M]. 东京:翰林書房.
- 岩淵宏子,北田幸恵,高良留美子. 1995. フェミニズム批評への招待—近代女性文学を読む[M]. 东京:学芸書林.
- 川西政明. 2012. 新日本文壇史:第8卷[M]. 东京:岩波書店.
- 刘春英. 2012. 日本女性文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円地文子. 1971. 円地文子集—新潮日本文学 37[M]. 东京:新潮社.
- 渡辺澄子. 1998. 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論—闇を拓く[M]. 京都:世界思想社.
- 黄芳. 2017. 论日本现代女性作家对肉体记忆好而精神记忆的重塑[J]. 外国语文(5):19-25.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Memory of the Japanese Female Writers From the Modern Period

HUANG Fang

Abstract: “Memory”,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cultural studies, has opened up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women's literature. In the Meiji and Taisho periods, advanced civilization imported from Western Europe were much admired and adapted by the Japanese society; nevertheless, women were excluded from this campaign and the ideal of being “a virtuous wife and a loving mother” still prevailed. If “bearing and raising children” carries the memory of the body, then “being a virtuous wife and a loving mother” the memory of the mind. Denying the prescribed female role as a wife/mother playing the part of bearing and rearing children, woman writers at that time gave an affirmative narrative of “sex of the subject”, which would fulfill one's desire. Breaking away from the shackles of conventional mindset which confined women to being an ideal wife/mother, female writers intended to, through their works, free and liberate women both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However, such a literary liberation whose rebellious surface conceals a deep connotation destined for rebuilding the memory, psychologically and physically, of the subject, i. e., women.

Key words: physical memory; psychological memory; virtuous wife and loving mother; women's liberation

责任编辑:肖谊